

汪维辉 著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

(修订本)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汪维辉 著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

(修订本)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汪维辉著.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2954-1

I. ①东… II. ①汪… III. ①古汉语—古词语—
语言演变—研究 IV. ①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017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DŌNGHÀN-SUÍ CHÁNGYÙNGCÍ YǎNBIÀN YÁNJIŪ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

(修订本)

汪维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954-1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½

定价:42.00 元

本书修订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的项目资助

本书初版荣获：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2000 年度)

第九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二等奖(200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语言学二等奖(2003 年)

序

本书是汪维辉同志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两年多前,当我读到他的博士论文时,十分欣喜。自己是搞汉语史研究的,除了语法外,也做过一些词汇研究。在跟几位同道交谈中,大家都认为,汉语史研究有两项基础性的工作必须做。一是有计划、有选择地开展各代的专书研究,全面考察、描写其中的语言现象。专书研究是断代研究的基础,而断代研究又是整个汉语史研究的基础。另一项是系统开展词汇史尤其是常用词演变史的研究。词汇史的研究跟语音史和语法史相比最为薄弱,最近 20 年的词汇研究侧重于对疑难词语的考释,而对常用词、对某一历史时期词汇系统的研究则很少着力,因此读到维辉同志的大作时感到难能可贵,很有会心之感。

词汇史研究不易,首先须要拿出勇气来面对数量浩大的历史文献资料,在勾稽、归纳、统计、判断上要做到准确、科学,谈何容易!没有良好的词汇学理论基础,没有扎实的古汉语专业知识,没有沉下心来做学问的踏实学风,是很难、也不愿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

本书所讨论的 41 组常用词都建立在丰富可靠的语料基础上,作者不仅排列用例,详加描写,而且还采用统计频率、考察词的组合关系等方法来说明同义词的演变交替过程;每组词讨论后都有小结,使人于纷繁中得其要领;文中的注释重在辩正语料、介绍有关观点与文献,包含了很大的学术信息量,可以说是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书虽以资料丰富翔实见长,但在总结规律、进行理论思考上也很见功夫。书中对常用词演变自身规律的探求、对常用词历史演变

基本类型的归纳,以及对判断新词替换旧词的标准的设定等,都很有见解,多所创获。作者对问题考虑细密、周全,处理谨慎。如对统计数据的局限性的认识,对构词语素旧成分有时比新成分更有能产性的认识,对前人有所研究的均予称引,对不详者暂予存疑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这种学风贯穿于全书,增强了这部著作在学术上的严肃性与科学性。

维辉同志当年是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张永言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张先生学识广博,兼通中外,富有独特的学术眼光,于汉语词汇史研究尤有专攻。名师出高徒,信不虚也。这篇序言本应由张先生来写,我是没有资格代庖的,但张先生近年身体不适,深受病痛折磨,嘱我代写,我难辞先生之诚意,写下上述感想,权为序。

江蓝生

1999/11/9 于北京听雨斋

目 录

第一章 概论	1
第一节 汉语词汇史研究的简要回顾	1
第二节 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意义及本书的宗旨	10
第三节 材料与方法	17
第二章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名词	23
1. 目/眼	23
2. 涕、泣/泪(淚)	31
3. 足/脚	39
4. 他人、异人/旁(傍)人/别人	58
5. 翼/翅(翮、羽、翼)	67
6. 囊/袋(袋)	76
7. 舟/船(舩、舩)	80
8. 木/树	84
9. 侧、畔、旁(傍)/边	91
10. 中、内/里(裏、裡)	98
第三章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动词	109
1. 衣、冠、服/著(着、箸)、戴	110
2. 视/看(翰)	122

3. 求、索/寻、觅	133
4. 寢、寐/卧、眠(暝)、睡	144
5. 言、云、曰/说、道	161
6. 呼(譁)/唤、叫(噉、啣)	177
7. 使、令/教(交)	192
8. 击/打	201
9. 悬(县)/挂(掛、挂)	214
10. 闭/关	225
11. 覆/盖	229
12. 释/放	238
13. 书/写、抄(钞)、騰(誊)	241
14. 曝(暴)/晒(曬)	252
15. 易、更/换	255
16. 建、筑、作、立、为/起、盖、戴、架	262
17. 还、返(反)、归/回(迴、廻)	271
18. 入/进	279
19. 居、止/住	291
20. 生/活	304
21. 宜、当/应、合	317

第四章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形容词

1. 愚/痴(癡)	326
2. 瘠(膾)、癯(臞)/瘦(瘦)	333
3. 痛/疼	339
4. 误、谬、差、忒、爽/错	342
5. 寒/冷	352

6. 速、迅、疾/快(駛)、驶	362
7. 广/阔、宽	375
8. 坚、刚/硬(鞮、鞞、鞞)	381
9. 甘/甜(詬)	389
10. 寡/少	394
第五章 结语	401
第一节 常用词演变的若干问题	401
第二节 从常用词看东汉魏晋南北朝汉语	420
参考文献	423
引用书目	427
附录一 41组常用词历时更替简表	432
附录二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442
附录三 汉语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评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	467
初版后记	478
修订本后记	483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汉语词汇史研究的简要回顾

本书旨在探讨汉语词汇史的核心课题——常用词演变问题。拟先从中古(东汉—隋)汉语入手。

在汉语史诸部门中,词汇史向来比较落后^①。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词汇研究本身难度大^②,另一方面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认识原因。在讨论本课题之前,有必要对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关的问题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这种研究基本上是在传统训诂学的范

① 吕叔湘先生曾指出:“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部分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页4)又说:“汉语的历史词汇学是比较薄弱的部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力量跟这项工作的繁重程度很不相称。”(《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读后》,《中国语文》1982年第3期,页235)(又分见《吕叔湘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2,页38、228。)

② 在语言的三要素中,词汇是最纷繁复杂的部分,最不容易找出其构成和演变的规律。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多有论述。房德里耶斯(J. Vendryes 1921/1992)说过:“词汇之所以有趣,正在于它的复杂性。”(页214)符淮青先生(1996b)曾说:“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比起其他语言学科来显得薄弱,词汇学面对的是数量庞大的语词材料,不管是共时、历时的研究,还是专书、专类词语的研究,都要求较长的、甚至是多年的积累。……在这个领域要求更多的踏实苦干的精神,要求付出更艰辛的劳动。”(“结语”,页400)又参看美国历史语言学家马尔基耶尔(Yakov Malkiel)的论述,见徐通锵(1984)页210;贾彦德(1992)有关语义研究的论述(页17—18)等。

畴内进行,研究对象主要是先秦两汉传世文献典籍中的疑难词语,以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各方面的知识为主要手段,以阐明词语的确切含义(有时还包括探明词语的得义之由等)为主要目的,取得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考释成果,为整理上古典籍和研究上古汉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0世纪4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传统得到继承并有新的发展,除继续考辨上古汉语的词语以外,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的拓展。开风气之先的是张相先生。他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一改传统训诂拘守先秦两汉典籍的积习,大胆地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唐宋以降的诗词曲,用清代学者的一套方法来考释诗词曲中“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相先生的开创性工作影响深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训诂学在以后几十年里的走向。继之而起的有蒋礼鸿先生,他的传世之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把研究材料拓展到19世纪末发现的敦煌文献,研究对象则主要为唐宋时期的俗语词,并注意在精密考释的同时对俗语词的来龙去脉作史的探讨,把汉语历史词汇和传统训诂学的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随着唐宋口语、俗语词研究的日趋兴盛,学者们一方面把研究范围继续往下延伸到元明清,另一方面则往上向魏晋南北朝溯源。这后一方面的工作似可以郭在贻先生为代表。郭先生说过:“关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向来是最薄弱的环节。”^①近三十年来,经过郭在贻等先生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魏晋南北朝词汇研究已经由冷落而繁荣,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专著如

① 见《读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中国语文》1989年第3期;又收入《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页328;《郭在贻文集》,中华书局,2002,第三卷页490。

林,各擅胜场,单篇文章多至难以计数。

以上这些成果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它们丰富了传统训诂学的内容,对古籍整理、辞书编纂等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也为建立汉语词汇史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材料。但是也应该指出,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属于训诂学的范畴,是传统训诂学的延伸和扩展。从严格意义上说,还称不上“词汇史”。^①

汉语史包括语音史、语法史和词汇史三个分支。语音史脱胎于传统“小学”中的音韵学。音韵学跟解读古书是一种间接关系,黄侃先生说过:文字音韵要落实到训诂上,训诂要落实到经典上。可见文字、音韵跟“经典”之间还隔着一层训诂。因此音韵学比较容易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加上音韵学研究对象系统性强,所以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它就完成了从传统语文学的一个门类向独立的汉语语音史的历史转变。此后断代语音系统的研究和语音发展史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汉语史诸部门中走在了前列。汉语真正语法学的诞生是在19世纪末,它一开始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存在为解读古书服务的问题。汉语语法史的成立虽稍晚于语音史,约在20世纪30—40年代,但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都是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训诂学是直接为解读古书服务的,它要摆脱“经学”(或者说“古籍学”)附庸的地位很不容易;而训诂学跟词汇史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词汇史发展迟缓,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① 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可参看:王云路、方一新《汉语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评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中国语文》2002年第2期(本书附录三);方一新《训诂学与词汇史异同谈》,《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六辑,商务印书馆,2013。

训诂学与词汇史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训诂的目的是“明古”,训诂学的出发点是为了读古书——读懂古书或准确地理解古书。因此,那些不必解释就能理解无误的词语,对训诂学来说就没有多少研究价值。词汇史则颇异其趣,它的目的是为了阐明一种语言的词汇的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而不是为了读古书,尽管不排除客观上会有这种功用。所以,在训诂学看来没有研究意义的词汇现象,从词汇史的立场去看可能恰恰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比如作为语言词汇的核心的“常语”,向来是训诂学者认为可以存而不论或者无烦深究的。然而,要探明词汇发展的轨迹,特别是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词汇的基本格局的变迁,即后者逐步形成的渐变过程,则常用词的衍变递嬗更加值得我们下功夫进行探讨。而这正是词汇史异于训诂学之处。因为不对常用词作史的研究,就无从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也无以阐明不同时期之间词汇的发展变化,无以为词汇史分期提供科学的依据。当然,常用词演变研究也只是词汇史的一个方面,一个重要的方面。词汇史所包含的内容还应当更全面,更丰富。在语言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模糊认识,有意无意地将训诂学和词汇史混为一谈,以为考释疑难词语和抉发新词新义就是词汇史研究的全部内容。这种认识对词汇史研究的开展是很不利的。这两门学问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并无高下之分,由于研究目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所用的方法和材料等等都有所不同。在目前词汇史研究还很薄弱的情况下,有必要分清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它们的区别。

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以黎锦熙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曾经花费巨大的精力编纂《中国大辞典》,想要“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帐,……规模务求大,材

料务求多,时间不怕长,理想尽高远”^①。这部《中国大辞典》的主旨之一是“探讨古今用语之变迁”,“所有古今单字及连绵两字以上之复合词或成语,概行采集,务求得其本始,明其流变”,“全书的第一个原则是:每一个词(包单字说)都要顺着它的时代(就可能的范围说,是从西元前十六世纪的甲骨文字到现代的国语和方言,绵亘约三千六百年),叙明它的‘形’‘音’‘义’变迁的历史”^②。在编纂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国语常用词”的概念。在材料收集方面,此书很注重“唐宋以来(约在第八九世纪以后)用近代语写成之文学作品,如诗,词,曲,白话小说,歌谣等;又佛家及儒门之语录,书札,以至现代之语体书报等”^③。在八九十年前即有这样的眼光和周密的计划是很了不起的。虽然由于时局变迁,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未能如期完成^④,但已经取得了不少“副产品”,如黎锦熙《宋元语词广证》十卷、《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一篇、《近思录释词》一卷(附《索引》一卷)、《“爸爸”考》一篇、何容《说现行语中之“爸爸”与“父亲”》一篇、刘复《“打”雅》一卷、《释“吃”》一篇、鄯侯《“打”字别用类例》一篇,等等^⑤。这些工作可以看作早期对汉语常用词历史演变的初步探索。

首先明确提倡“词汇史”研究的则当推王力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王力先生就撰文指出:“古语的死亡,大约有四种原因:……第二是今字替代了古字。例如‘怕’字替代了‘惧’,‘铐’字替

①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3“大辞典编纂处之成立”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页200。

② 此句引文见上引书页304。

③ 以上引文除另加注者外均见上引黎锦熙书所录《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计画书》,页201—202。

④ 半个多世纪以后编纂出版的《汉语大词典》才圆了几代学人的“大辞典”梦。

⑤ 参看黎锦熙上引书卷4“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节所录《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第六次报告书》(1934年5月),页304以下。

代了‘裤’。第三是同义的两字竞争,结果是甲字战胜了乙字。例如‘狗’战胜了‘犬’,‘猪’战胜了‘豕’。第四是由综合变为分析,即由一个字变为几个字。例如由‘渔’变为‘打鱼’,由‘汲’变为‘打水’,由‘驹’变为‘小马’,由‘犊’变为‘小牛’。”^①又说:“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例如‘鬆紧’的‘鬆’字和‘大腿’的‘腿’字,《说文》里没有,因此,一般以《说文》为根据的训诂学著作也就不肯收它(例如《说文通训定声》)。我们现在要追究,像这一类在现代汉语里占重要地位的字,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至于‘脖子’的‘脖’,‘膀子’的‘膀’,比‘鬆’字的时代恐怕更晚,但是我们也应该追究它的来源。总之,我们对于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虽然古今书籍有限,不能十分确定某一个语义必系产生在它首次出现的书的著作年代,但至少我们可以断定它的出世不晚于某时期;关于它的死亡,亦同此理。……我们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②王先生所说的“新训诂学”,实际上就是词汇史。后来他又在《汉语史稿》第四章“词汇的发展”中勾勒了若干组常用词变迁更替的轮廓。我觉得不妨把这样的一组组词叫作“古今词”^③,我们可以给它下一个定义:同一个指称对象(或者说“义

① 《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原载《国文月刊》第9期,1941年7月;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0,页414。

② 《新训诂学》,原载《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又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页321。

③ 这是由“古今字”类推而来的一个名词。段玉裁曾经管这种语言现象叫“古今语”。《说文·未部》:“未,豆也。”段玉裁注:“未、豆古今语,亦古今字。此以汉时语释古语也。”段氏说未和豆是古今语,是对的;说它们也是古今字,则不妥。参看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页273,商务印书馆,1990。蒋绍愚先生(1989,页6)和王政白先生(1992,代序页8)都曾经谈到“古今同义词”,实际上也是指的这种现象。又,王凤阳先生(1993/2011)称“‘舟’、‘船’是古今词”(页243)，“‘忒’和‘差’是古今词”(页491),可见王先生已先我使用这个名称。

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用两个以上不同的词来表示，这样的一组词就叫作“古今词”。一组古今词内的各个词，时代上有先有后，相互之间往往有递嬗更替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古今”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先秦为古则两汉为今，两汉为古则魏晋南北朝为今，余可类推。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以后，陆续有学者对王先生所论及的各个新词出现的时代上限提出修正，但讨论对象基本上没有超出他举例的范围，且仅以溯源（找出更早的书证）为满足。溯源当然是词汇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因为不明“源”就无从探讨“流”；但是仅仅溯源是远远不够的。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上述这些零星的补充修正以外，王力先生所倡导的“词汇史”构想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和积极的实施。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古汉语疑难词语的考释和新词新义的探究呈现一派繁荣兴旺的喜人景象，大型历史性语文辞书《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也相继陆续问世，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事真正意义上的词汇史研究的人却依然稀如凤毛麟角。除从语法史的角度对一部分虚词作过一些史的探讨以外^①，实词方面的研究成果很难见到，常用词演变这一课题更是很少

① 对虚词的来源及其发展过程作史的探讨的成果比较多，如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李宗江《“即、便、就”的历时关系》（《语文研究》1997年第1期），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中华书局，1999）等。

有人涉及^①。

在近年出版的《蒋绍愚自选集》中,蒋先生多次论及常用词演变研究的问题^②,还有专文《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③,分析探讨了与“口”有关的四组动词从《世说新语》到白居易诗到《祖堂集》的发展演变情况,并运用了判别新词与旧词的两种基本方法——统计

- ① 郑奠先生的《汉语词汇史随笔》(《中国语文》1959年第6、7、8、9、11、12期、1960年第3期、1961年第3、4、6期连载)是较早从史的角度对汉语常用词中的实词进行探讨的佳作,值得称道。参看符淮青(1996b)对该文的介绍和评价(页223—224)。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部分曾提到过一些常用词的古今差别,但都很简单,断定新词的始见时代又往往偏晚。任学良(1987)曾对此有所订补,大都属于提前新词新义的始见时代,而所引例证往往未必可靠。在本书所讨论的41组常用词中,王编《古代汉语》曾提及过的有如下各组:寡/少(104.“寡”字条,105.“少”字条,1/149—150),视/看(129.“望”字条,1/217),入/进(194.“进”字条,1/318),坚/硬(280.“坚”字条,2/426),疾/速/快(410.“快”字条,2/583),目/眼(429.“目”字条,2/592),寝/寐/卧/眠/睡(502.“寐”字条,3/806),求/索/寻/觅(560.“寻”字条,3/930),归/返/还/回(578.“回”字条,3/938),足/脚(632.“脚”字条,3/958),甘/甜(677.“甘”字条,3/1076),寒/冷(681.“寒”字条,3/1078),木/树(705.“木”字条,3/1088),涕/泪(722.“涕”字条,3/1095),居/住(752.“宿”字条,3/1191),书/写(853.“写”字条,4/1330)等。王凤阳先生(1993/2011)的《古辞辨》是一部辨析古汉语近义词的巨著,全书共辨析条目1403组,单词4000余个,本书所讨论的41组词书中大部分都收入论列了。此书以辨析词义的异同为职志,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具见功夫,对古汉语教学和词义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古今词”问题虽然也时有涉及,但并非作者关注的重点,故往往语焉不详,对词的时代性的论断也多嫌粗疏。王政白先生(1992)的《古汉语同义词辨析》有时也论及“古今同义词”的时代关系问题。张双棣先生的《吕氏春秋词汇研究》和魏德胜先生的《〈韩非子〉语言研究》(参看第二章 语义研究(上),页10—66)也曾论及一部分常用词在战国时期的变化。此外有少量单篇论文曾涉及这一领域,如:解海江、张志毅《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兼论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论的转折》(《古汉语研究》1993年第4期);李宗江《“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中国语文》1997年第3期);董志翘《再论“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与李宗江先生商榷》(《中国语文》1998年第2期);吕东兰《从〈史记〉、〈金瓶梅〉等看汉语“观看”语义场的历史演变》(《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一辑,商务印书馆,1998)等。
- ② 如《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常用词演变的研究”节、“各阶段词汇系统的描写”节,又如《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一文中对《祖堂集》里“木/树”“道/路”“言/语/说”等几组同义词的考察(此文原载《中国语文》1989年第1期)等等。
- ③ 原载《语言研究》1993年第2期。